

八十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

第一篇 政治丑闻

民主党乘机发难 共和党化险为夷——“辩论门事件”之争

1983年夏，当人们对11年前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宪法危机”——“水门事件”还记忆犹新之时，美国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又转移到了另一桩同样发生在共和党人在任总统身上的政治丑闻——“辩论门事件”。如果说“水门事件”把在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从总统蝉联宝座上摇落下来的话，那么“辩论门事件”却只给了在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政府一场虚惊。但即使如此，“辩论门事件”仍狠狠地刺激了里根总统的政治神经。

两党备战 幽灵再现

1983年是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的第三年。当时，美国经济已爬出低谷、开始回升，失业人数也渐渐减少。这对里根来说无疑是他可能蝉联第50届总统的好兆头。事实上，1983年1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一致推举里根和布什再度参加第50届总统的角逐。同年4月，尼克松也表示希望里根重新出马竞选。里根自己也曾多次暗示，他的任务难以在一个任期内完成，并声称布什是他最理想的搭档。弦外之音，一闻即知。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吹响了争夺第50届总统宝座的进军号角。迄止1983年6月，该党已先后有6人宣布争取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尽管这些竞选者还“玩不出多少惊人的花样来对里根挑战”，但却正在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以图改变他们在竞选前的不利局面。

显然，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积极备战，以图在争取第50届总统宝座的竞争中决一雌雄。恰在此时，“水门事件”的幽灵又一次萦绕在白宫的上空。

是年春夏之交，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劳伦斯·巴雷特在其新著《同历史赌博》中披露出一条爆炸性消息。他在书中叙述到，1980年大选中，里根的竞选班子弄到了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竞选班子为卡特“准备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总统竞选辩论简章的副本”，并利用这些材料赢得了同卡特进行的面对面的电视竞选大辩论的胜利。此事一披露，立即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纸争先恐后地披露此事件的各个细节，有人“机智地”称之为“辩论门事件”。

为了“能轻易、迅速地”制止事件所引起的争论，里根的白宫班子于1983年6月28日主动地交出了1,000页“辩论简章”的文件材料。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朝着白宫所希望的相反方向的发展，那被打开了的“潘朵拉盒子”已无法关上。民主党人立即利用此事对共和党人大加挞伐，他们指责共和党“就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并敦促国会和司法部迅速调查此事。6月2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受司法部的委托开始过问此事。同一天，美国国会也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领导该委员会的正是民主党人、众议员唐·阿尔博斯塔。唐·阿尔博斯塔接受此任务后，他发誓说，他将“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必要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彻底搞清这个问题。”

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里根总统不得不作出反应，但奇怪的是，他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开始，里根认为所谓“辩论门事件”只不过是新闻界“无事自扰”，因而竭力加以否认。到白宫将有关材料公布之时，他又说在此之前“从不知道有此事”，并依然狡辩道，这些材料又“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言外之意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当7月9日，调查人员从他自己的竞选档案中发现有《卡特拟议的辩论和竞选宣传的策略》的材料后，里根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公开向新闻界表示，他

已要求内阁成员，包括他本人同联邦调查局“充分合作，”随时接受查询，以便“把真相搞清”，如果发现内阁成员有越轨行为则予以包括解除职务等必要惩处。

由于该事件又一次涉及到在任总统共和党人在竞选中的舞弊行为，再加上里根对此事件前后态度的转变与当年尼克松在处理“水门事件”时前后态度的转变有惊人相似之处，（即都经历了否认、默认、公开表态等三步曲）。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辩论门事件”是11年前“水门事件”幽灵的再起。

“偷来的政治商品”

“辩论门事件”败露之后，白宫班子的许多人似乎预感到大祸临头，他们就“象吓破胆的罪犯”纷纷出台作证。然而，里根总统却似乎毫无惊恐之色，他还一再申辩道，他们所获得的“辩论简章”并非“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只要分析一下白宫自己所公布的以及调查人员在里根1980年竞选档案中发现的有关卡特“辩论简章”材料的内容，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事实上，这些材料对于里根赢得总统大选辩论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有关卡特“辩论简章”的材料主要涉及到前总统卡特的助手们为卡特准备的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提出了“在竞选中”卡特“容易遇到里根攻击的主张”；概述了“对卡特的对外政策”可能提出的“批评”；指出了预计会在辩论中“提出的问题 and 应作出的答复”。甚至还包括卡特的谋士们告诉卡特怎样舌战里根的辩论技巧。例如，在“辩论简章的副本”中就有关于这些谋士们建议卡特把辩论拉到不利于里根的主题上的片断。这些谋士们认为卡特要多谈谁更善于解决内外政策的话，他们说，“你（卡特）是谨慎从事的，而他（里根）就未必如此；你已经干得有点门道了，他却缺乏经验；你懂得事物的复杂性，他却没有。”等等。

如果上述材料还“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那么什么才够得上是“竞选策略的东西”呢？无怪乎卡特的原新闻秘书鲍威尔在获悉“辩论门事件”之后气愤地说：任何人弄到这些材料都将是他在竞选中能搞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

据调查，里根的竞选班子弄到“辩论简章的副本”后，如获至宝，他们立即对这份“偷来的政治商品”加以研究。为了达到战胜卡特的目的，他们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道德准则，竟然把“简章”副本送给一位所谓“持保守观点的独立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威尔过目，并请他手把手地“辅导”里根如何准备那场“唯一的、也是关键性”的电视辩论。后来担任里根政府的预算局局长的戴维·斯托克曼自己也承认说，他在竞选期间曾多次扮演卡特与里根进行模拟辩论。不过，他接着竟大言不惭地说，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由于里根早已摸清了卡特的底牌，“知己知彼”，又事先有所准备，因而他在1980年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对答如流，占了上风”。至于卡特则因天机泄露，在辩论中吃了大亏。

“鼯鼠”之谜

人们在了解了卡特被盗的“辩论简章的副本”的内容及其真正价值后，很自然地又把目光投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上，即里根竞选班子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卡特的“辩论简章的副本”的？是卡特竞选班子里有人主动提供的，还是里根班子有意识地、积极地去弄到手的呢？

在调查的过程中，人们确实发现里根竞选班子中有一大堆人牵扯到此事，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里根政府班子的主要成员。例如有罗伯特·格雷、威廉·凯西（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温·米斯（曾先后任总统顾问和司法部长）、詹姆士·贝克（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戴维·格根（后任白宫联络处处长）、戴维·斯托克曼、里根总统的一名助理韦恩·瓦利斯等。其中凯西、格根在1980年竞选时，主要为里根收集竞选资料，贝克、斯托克曼则负责具体指导里根同卡特进行的“那场辩论”。令人吃惊的是，当这些人在被查询时，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主动地交待了他们在1980年总统竞选时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提供了一些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证据，但却“都说不知道是怎样得到这些材料的。”格根说，是凯西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的。而凯西却矢口否认，并说“不记得收到过这些文件”。

事实上，关于“辩论简章的副本”的来源方式问题，调查人员唯一能找到的较为满意的证据是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是在格根的卷宗档案中发现的。该备忘录上记载，里根竞选班子所获得的某项材料是从“同为卡特筹划辩论的一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那里得到的。这一证据正好与劳伦斯·巴莱特在《同历史赌博》中所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相吻合。劳伦斯·巴莱特在书中推测说，“辩论简章的副本”很可能是卡特竞选班子中的一个“鼯鼠”无偿地提供的。然而，谁是真正的“鼯鼠”呢？这只“鼯鼠”是否果真加合众国际社记者所报道的那样，他是里根竞选班子“安插在白宫（卡特任总统时）的内线”人物吗？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始终没有找到“证据说明卡特总统的白宫与此事有牵连”，因此，他们最后只得把寻找“鼯鼠”的希望集中到里根竞选班子的身上，其中被怀疑的关键性人物是凯西。恰在此时，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被披露。1983年7月17日，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总统1980年竞选活动的经理人威廉·凯西曾经募集前联邦特工人员建立了一个政治情报网。他利用这些人从他们仍在任职的同事那里收集政治情报，以帮助里根进行竞选活动。遗憾的是，凯西及其助理随即发表声明对上述报道加以否认，而对他们在1980年里根竞选期间是否干过“盗窃”文件的勾当一事一直守口如瓶。至此，司法部和国会关于寻找“鼯鼠”的调查已走入死胡同，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1984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发表一份报告说，关于1980年里根竞选班子获取前总统卡特为辩论准备的书面材料一事，联邦调查局用了8个月的时间，向200多人作了调查，并检查了1,000多箱文件和录音带，但没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此事已构成犯罪。同年5月23日，美国国会负责调查此事的小组委员会也发表了一份长达2,413页的报告。报告说，尽管大多数的证据表明，卡特的辩论提纲是“通过负责人凯西之手转给了里根——布什的竞选班子”的，但“没能确定凯西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关于卡特竞选战略的这些情报的”。这就是说司法部和国会对“辩论门事件”的调查，因无法解开“鼯鼠”之谜，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但是，美国政界仍围绕此事争论不休。站在前总统卡特一边的人坚持说，“里根集团是以水门事件那样的手段入主白宫的”。而里根的助手们在“一场虚惊”之后，则指责民主党人和新闻界在“造假门”。

是谁在幕后策划——“彩虹战士”号被炸案揭密

1985年7月10日深夜，停泊在新西兰北部奥克兰港的一艘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彩虹战士”号奇怪地爆炸了，船上一名摄影师当场死亡。此事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严重关切。经过大量调查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新西兰警方找到的几条重要线索竟条条通向法国，引起巴黎满城风雨。真正的凶手和幕后主谋者究竟是谁……

午夜巨响 震惊新府

1985年7月10日深夜，新西兰北部的奥克兰港已寂静下来，一艘和普通渔船没有太大区别的船只停泊在码头上，它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

“彩虹战士”号对国际新闻界，对新西兰、法国、美国等国政府来说都不陌生。它是绿色和平组织租来的一艘平底渔船，船长48米，自重约449吨。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环境保护主义组织，1970年由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发起成立于加拿大。到1985年时已有成员50万。该组织以反对核试验、反对捕鲸、反对运输核废料、反对环境污染为宗旨，成立15年以来活动频繁。3月间，该组织成员曾驾驶“彩虹战士”号去过夏威夷，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反对美国核试验的大规模活动。5月初，“彩虹战士”号又抵夸贾林岛，反对美国从加洲发射洲际导弹。这一次，他们又准备去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在该岛进行核试验。

大约零点时分，30多人从“彩虹战士”号上走了下来。他们在码头上拥抱、告别，最后互道“晚安”。25个人上岸走了，剩下的人又回到船上。

那离去的25个人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刚刚在船上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研究和部署了该组织即将采取的重大行动。回船的人是这条船上的船员，其中有一位葡萄牙籍摄影师佩雷拉。他们送走了领导之后，他们便各自回舱安歇。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船体立即剧烈摇晃起来。刚刚上床的船员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一位船员发现船体右侧被炸开了个大洞，海水呼呼地直往船里涌，马上大喊：“船被炸了，快上岸！”人们在慌忙中匆匆离船上岸。总共12个人，一会儿便全部登岸。这时，佩雷拉忽然想起他那心爱的高级照相机还在船上，就不顾一切地又飞跑回船上。不料，就在他踏上船的一刹那，贴在船左侧的另一枚水雷爆炸了，其声音之响，爆炸力之大，都远远超过第一次爆炸。船体歪歪斜斜地迅速往海底沉去，可惜，年仅38岁的佩雷拉也随之葬身海底。

爆炸声打破了奥克兰港的宁静，惊动了整个新西兰。当警方确知被炸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后，顿感事关重大，立即向惠灵顿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新西兰总理朗伊获悉“彩虹战士”号被炸后，马上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封锁现场，搜索海面，全力以赴捉拿凶手。

条条线索 皆指巴黎

新西兰警方接到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开始了调查活动。警方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爆炸案的指挥部，抽调66名精干警察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兵分三路：一路奔赴现场，一路搜索海面，另一路前往秘而不宣的地方。

负责海面搜索的小队很快就在离爆炸地点不远的海面发现一艘可疑的小气垫船，但船上空无一人，无疑，是被人遗弃的。警察在船上找到一只潜水用氧气瓶以及通讯器材数件，上面还有两个人的指纹。这些器材不但有“法

国制造”字样，而且据检验还属法国的军用物品。

凶手会不会是法国人？警方的脑子里马上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另一组在港口调查的小组也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据目击者披露，在案发的当天，有一对年轻夫妇驾驶野营汽车多次出没于“彩虹战士”号周围。调查人员立即抓住这条重要线索，他们询问宾馆、饭店，检查码头、车站和机场的过往游人。两天后，即7月13日，终于在奥克兰港找到了那对夫妇。过对夫妇执瑞士护照，但警察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了护照是假的，于是，当即把这对“夫妇”扣下了。

经盘问，这一男一女根本不是夫妻，他们也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他们的护照是偷来的。这时，警察联想到小气垫船上发现的两个人的指纹，会不会是这对“夫妇”的。检验结果，正是他俩的。

原来，这对“夫妇”是法国秘密情报组织——国外安全总局的两名军官。男的是阿兰·马法尔少校，系国外安全总局行动处阿斯普雷多航海基地蛙人培训中心的教官；女的是弗朗索瓦兹·普里厄上尉，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任职。他俩于6月17日途径伦敦飞抵奥克兰港，冒充瑞士旅游者。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在7月5日，曾租了一辆丰田牌小轿车，到过新西兰北部璜加雷港附近的一个小港，并与“乌维阿”号帆船上的3名法国船员有过接触。与此同时，另一路人报告：在案发前不久，“彩虹战士”号附近的海面上出现过“乌维阿”号帆船。

两个来源不同的情报都涉及“乌维阿”号。警方决定追踪“乌维阿”号，并呼吁有关方面给予支援。7月13日，澳大利亚诺福克岛的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了“乌维阿”号。他们马上通报新西兰警方，同时采取行动截住了这条船。经检查，船上的3个人都持有巴黎签发的护照。证件无懈可击，加上澳大利亚警察当时也无权传讯他们，所以只好释放，但没收了他们的一卷底片和一张奥克兰港详图。

当新西兰警察闻讯赶到诺福克岛时，“乌维阿”号已无影无踪。他们立即乘快艇追赶，终于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港找到了“乌维阿”号。但3名法国船员已不知去向。船上只剩下法国汤姆森公司的电子导航设备和洲际联络发射电台。

实际上，这3名船员都是法国国外安全总局的特工人员——阿斯普多航海基地的蛙人。今年6月，他们来到努美阿，在当地的游艇租赁公司租下了“乌维阿”号帆船。他们花了整整4天时间，在帆船上安装了通讯设备、电子导航装置、洲际联络发射电台。同时又租了一台压气机，3个减压阀和一只潜水用氧气瓶。6月20日，他们驾船来到璜加雷港附近的一个小港，与前面说到的那对假“夫妻”取得了联系。

随着掌握的情报越来越多，这3名法国船员涉嫌也越来越大。7月26日，新西兰当局发出国际通缉令，追捕这3名可疑人士。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调查，新西兰警方发现了3条重要线索，而这3条线索条条通向巴黎。

8月初，新西兰总理朗伊听取了“彩虹战士”号爆炸案调查小组的初步调查结果和分析，毅然决定派警员追到法国去，继续深入调查，捉拿凶手。

冠冕堂皇 贼喊捉贼

70年代初期，绿色和平组织就频繁活动于南太平洋，进行反核宣传。到

了 80 年代又有强化之势，法国军方为此深感不安。1984 年 9 月 4 日，法比尤斯总理和国防部长埃尔尼同时收到国外安全总局送来的一份关于绿色和平组织的绝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该组织与苏联某些宣传机构有直接联系，在南太平洋大肆活动，在反核、反法宣传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正在成为一个很有动员力、十分危险的“压力集团”。这份编号为 39·81/CE 的报告鼓动上级领导部门下决心对该组织采取果断的打击行动。

1985 年 3 月初，法国核试验中心管理局局长亨利·法热海军上将从海军情报部门获悉，国际性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将驾驶“彩虹战士”号等 4 余船，前往南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在那里搞核试验。法热立即给国防部长办公室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侦察“彩虹战士”号的活动；主张国外安全总局可以不局限于收集情报，还可采取“有力措施”，扼杀绿色和平运动的抗议活动。

国防部长接到报告后，对法热的建议非常欣赏。3 月 4 日，埃尔尼召见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密谋此事。3 月底，两人再次会晤，决定派国外安全总局行动处的蛙人悄悄炸沉“彩虹战士”号船，并要求绝对不能造成人员伤亡。炸船地点选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因为帕皮提和新加坡定期有飞机飞往那里，潜入容易。而据了解，“彩虹战士”号又必将在该港停靠。

拉科斯特马上通报密特朗总统，对行动的宗旨和部署一一作了概述，并保证不造成人员伤亡，不留下蛛丝马迹，因此也不会牵连到法国。3 月 22 日，总统特别参谋长通知拉科斯特，国防部这一计划得到了总统府的批准。于是，拉科斯特一面向总理府申请特别活动经费，一面下令行动处开始行动。

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炸船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彩虹战士”号被炸以后，当新西兰方面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追查凶手时，法国方面则在热烈而欢快地庆祝国庆节，法国的报界对这桩后来成为爆炸性新闻的事件的报道也仅仅是几行小字而已。7 月 16 日，法国总理府获悉，新西兰警方已把调查炸船案的注意力集中于法国方面，新的情况表明，法国国外安全总局卷入了此案，被新西兰警方捕获的那对“夫妇”实际上是法国的两名特工人员。法比尤斯总理当即宣布组成一个内阁“危机小组”，参加者除了国防部长埃尔尼以外，还有内政部长若克斯、司法部长巴丹诺、总统府秘书长比昂戈。然而，这个“危机小组”并不想调查“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的真相。“危机小组”在召开第一次会时，有两个人——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知道法国是炸船案的制造者。内政部长开始怀疑到这一点。但是所有人都不愿把牌摊到桌上，而是摆出一副追查真相的架势。

8 月 6 日，新西兰警察来到法国调查“彩虹战士”号爆炸案，尤其是法国国外安全总局涉嫌此案，这宛如两块巨石投入一泓湖水，顿时激起片片涟漪。舆论界为之哗然，反对党激昂慷慨。巴黎满城风雨。

8 月 8 日凌晨 1 点，法国政府公布了密特朗总统给总理法比尤斯的一封信。密特朗责成政府调查法卷入这一事件的真相。他表示，责任查清后，“不管犯罪者是什么级别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法比尤斯总理接到总统指令后，马上复信表示，要“请一位没有争议的人士来收集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情况”，以便使他“最明确他说明法国情报人员和机构，以及法国当局是否了解这一犯罪事件的策划，或是否参与了这一事件。”当天下午，法比尤斯任命原戴高乐总统府秘书长、行政法院法官、无党派人士特里科负责

调查“彩虹战士”号事件。

一场由政府首脑导演的骗人把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遮遮掩掩 漏洞百出

自8月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下令政府调查有关法国卷入绿色和平组织“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的真相以来，法国掀起调查“彩虹战士”号案件的波澜。在前一段时间几乎对此案不闻不问的新闻界，派出精干人马，对此案进行追踪调查。他们不断披露材料，爆出惊人消息。有些报刊开始怀疑法国有关机关参与了炸船事件，并指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国外安全总局的第二把手副局长埃曼将军。有的报刊更明确地指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没有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的，现在社会党政府企图洗刷自己，把责任推到下级。

在事发初期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各政党，在8月19日的参议院辩论会上打破了这种沉默。保卫共和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夏尔·帕斯卡说，政府应对“彩虹战士”号事件承担责任，不要想推出一些替罪羊来逃避其责任。法国民主联盟主席勒卡尼埃说，法国情报机关的行动是荒唐可悲的，他们显然是接受命令而干的，现在要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这两个主要反对党都激烈指责政府并要法比尤斯总理辞职。

在传播媒介及参议会上闹的沸沸扬扬之时，法国有关当局始终保持沉默，无论是总统府、总理府、国防部还是被公开指责卷入的国外安全总局，均未对这一事件作过任何评论，对报界的指责也不置可否，他们在耐心地等待公布特里科的调查报告。因为他们相信，调查报告会“洗刷”掉新闻界对他们的指责。

8月26日，特里科调查小组终于拿出了关于法国同“彩虹战士”号被炸案关系的调查报告。特里科说，他查阅了“以前同事件有关的文件”和法国“外交代表及武官发回的电报”。会见了包括国防部长埃尔尼在内的许多政府成员，以及三军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上将和他的主要部属等。他还听取了国外安全总局的几个工作人员的证词，特别是被派往“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特工人员的证词”。并同新西兰驻巴黎大使进行了接触。

特里科的结论是：法国政府一级没有作出过要使“彩虹战士”号蒙受损害的任何决定。国外安全总局没有给它在新西兰的特工人员下过与正确执行政府指示不同的命令。国防部长埃尔尼和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都是“无辜的”。

至于被派往奥克兰的6名特工人员（他们是那对瑞士假夫妇、“乌维阿”号帆船上的3名法国船员和一名打入绿色和平组织的“女地质学家”），他们的任务只是监视“彩虹战士”号，他们在奥克兰港“严格执行”了他们上司的指示，“没有任何越轨行动”。

关于谁是肇事者，特里科提出有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孤立的个人行为”；第二，可能是别的特工部门干的，而“让法国为行动承担责任”，从而“损害法国”。

调查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法比尤斯总理又发表声明，重申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不容触动，并再次指出那6名法国特工人员不是作案人。总理要求新西兰政府提供证据，并表示“如果证实确是法国人干的，一定法办”。

新西兰对特里科报告和法比尤斯的声明极为不满，认为法国的结论为时尚早。朗伊总理8月27日对记者说，他的政府欢迎特里科去新西兰继续调查，

并保证为特里科的调查“提供方便”。他还要求法国总理就法间谍在新活动一事道歉，否则，他的政府将驱逐法国驻新大使。

特里科调查报告漏洞百出，缺少起码的可信性，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巴黎《解放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毛线越洗越干净”（在法文里，“特里科”这一姓氏与“毛线”拼写法一样）。然而，在这份急于为政府开脱责任的报告中，特里科埋下了两颗定时炸弹。首先，他突出了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把总统府推到第一线。其次，他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一项必须很快进行的行政调查很难作出最后结论”。“在提出这项报告之后，在法国应该再进行一次更为详细的调查研究。”特里科在报告公布后甚至公开表示：“不能排除我在调查中也受到愚弄的可能。”

这实在是一份令人哭笑不得的报告。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嘲弄报告是“专业化造假的范例”。

法国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政府内对此事态度不一致导致出现了内阁危机。法比尤斯总理和内政部长若克斯决心压总统做出“牺牲”国防部长的决断，从而达到保全他们的目的。在新闻界的卷入下，一场以埃尔尼为目标的“狩猎”开始了。

舍弃车马 保全将帅

特里科调查报告不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使人们对政府遮遮掩掩，推卸责任的做法愈加反感，新闻界更是不甘寂静，各报纷纷捅出内幕，掀起了“彩虹战士”号事件的第二次冲击波。

9月17日，法国一家大报《世界报》在头版刊发独家报道。这家报纸引用了多种消息来源。它说，在奥克兰炸沉“彩虹战士”号并炸死了一名绿色和平组织船员的炸弹，是与已经被点名的那些法国特工人员不同的第三批身份未明的特工人员安放的。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一行动计划，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授权特工人员干的。这家报纸还说，法国国防部当局对特里科提供的情况是假的。

这一披露是致命的，它彻底击垮了国防部长的辩护词。《世界报》刊出上述报道之后，埃尔尼感到大势已去，立即打电话给总统提出了辞呈。但是，总统加以拒绝。埃尔尼以为，这是总统在鼓励他顶下去。于是，国防部当晚就发表了一份公报，指责有人正在为诋毁法国军界而造谣生事。同时，他自己也向报界发表讲话，声明他从未下达过要炸沉“彩虹战士”号的命令。

次日，到了内阁会议上，埃尔尼才看到事情无法挽回了。法比尤斯态度十分明确，事件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他告诉总统：“我非常理解您的难处。”开会的时候，埃尔尼完全意识到，总统已经把他抛弃了。会上，内政部长的发言几乎变成了对国外安全总局的起诉。

内阁会议后，埃尔尼与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离开总统府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和痛苦。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已经感觉到水在不断涨高，只好决定把他一个人沉下水底。换句话说，总理和内政部长终于得手了。他被推落陷井，再挣扎也无济于事。

9月20日，埃尔尼正式向总统递交了辞职书。埃尔尼是密特朗30多年来的挚友，两人关系甚笃。密特朗当上总统后，他又成了密特朗的得力助手。对他的辞职密特朗不免感到惋惜，但现实又是如此“严酷”，迫使密特朗不得不择泪割爱，同意了埃尔尼的要求。同一天，总统府发表了密特朗写给埃尔尼的信，信中对他充满了赞誉之词。

在埃尔尼挂冠的同时，政府又解除了拉科斯特上将国外安全总局局长的职务，全面改组国外安全总局。

9月22日，法比尤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是“国外安全总局的人员炸沉了这艘船。他们是奉命行事。”次日，又通过法国驻新西兰大使向朗伊总理表示口头道歉。25日，法比尤斯在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说，是埃尔尼和拉科斯特两人采取的行动，“主意也是他们这一级拿的，责任应由他们这一级来负”。当记者问道他是否知道炸沉在奥克兰港的“彩虹战士”号的计划时，他说：“国防部长从未对我谈起准备炸船一事，直到9月21日。”这表明，法国政府想以两位官员的辞职和被革职来平息风波。果然，由于朝野主要政党在防务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反对派头面人物基本保持沉默，谁也不敢利用此事公开去捞政治便宜，除了新闻界一度还在关心究竟命令来自何人外，此事在法国逐渐平息下来。

互有所求 了结悬案

法国在新西兰奥克兰港炸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被新西兰政府认为是对其主权的侮辱，也是对其领土上坚持和平的人民的挑战。所以尽管法国总理已向新西兰政府作了口头道歉，并请求新西兰政府对被逮捕的执行任务的法国特工人员免予惩罚，但新西兰政府并不理睬，于当年11月22日，判处两名法国特工人员10年徒刑。

法国两名军官在新西兰被判刑，对法国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堪的事。自9月以来，法国先后派出外长、条法司长、大使分别在纽约、日内瓦以及巴黎就两名军官被关押的问题，同新西兰相应级别的官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谈判，但由于新西兰公众舆论中80%主张法国“间谍”必须在新西兰服满刑期，谈判没有结果。

次年3月，法比尤斯下台，希拉克组成内阁。这尴尬问题悬在那里，如同“脚上扎了刺”，“很不舒服”。虽说系前届政府所为，但毕竟是法国的“家丑”，需要尽快拔掉。总理府办公厅主任说，政府为此进行了“困难的”、“小步的”、但“大量的”秘密外交。与此同时，法国对新西兰政府施展了“巧妙”的经济制裁手段，频频施加压力。海关对来自新西兰的货物严加“检验”，百般挑剔：食品罐头常常“不符包装标准”，冷藏羊脑“不宜食用”。

新西兰农产品丰富，20%销往西欧共同体国家。在1986年8月1日以前，共同体将重新审批1987—1988年度新西兰的黄油、羊腿出口配额。共同体规定，在成员国一致同意下，才允许第三国货物进口。4月底，希拉克总理曾暗示说，如果两名法国军官继续在新西兰服刑，法国人将无法理解欧洲还会进口新西兰货物。新西兰政府一听，就辩出了此话的“含意”和“份量”。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也放松了口气，表示愿意在一定条件下解决这桩影响法新关系的悬案。

6月19日，新西兰和法国政府宣布，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解决它们在“彩虹战士”号问题上的争端。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裁决”下，法、新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拉下了“彩虹战士”号悬案的帷幕。

根据协议，法国向新西兰正式道歉；法国赔偿新西兰700万美元；法国的两名特工人员离开新西兰，前往法国在南太平洋豪岛的一军事基地“服刑”3年，其间可同家人团聚，但不得与新闻界接触，在两国政府达成新的协议前，他们不得离开军事基地；新西兰可同过去一样，向欧洲共同体出口其产品。

历时一年的“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终于得以了结。

跌宕起伏，似了未了——“伊朗门”事件曝光

石破天惊 风波乍起

1979年11月4日，激动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0名使馆人员扣作人质，酿成了轰动一时的人质事件。从此，美国和伊朗成了冤家仇敌。

7年后的这一天，黎巴嫩的一家不起眼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访德黑兰，同伊朗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伊朗方面要求美国提供军火。随后，数架美国运输机给伊朗运送了战斗机零件和弹药。

同一天晚上，出席庆祝德黑兰青年学生占领美国使馆7周年集会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突然宣布，麦克法兰曾秘访伊朗，时间是1986年5月28日。当时，麦克法兰带着4个人，装扮成机组人员，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装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亲笔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关系，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此外，他还带来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美伊打开良好关系的钥匙形蛋糕和准备赠给伊朗官员的象征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几把科特式手枪。拉夫桑贾尼声称，他下令将麦克法兰及其随从软禁在旅馆达5天，此后，他们被驱逐出境。

犹如平地里刮起了一阵狂风，整个世界都被震惊了。

目瞪口呆，兴高采烈，惊慌失措……这就是各种人听到这两条消息后的最初表情。当然，反应最灵敏，行动最快的要数那些“唯恐天下不热闹”的西方记者了，他们立即施出浑身解数，连篇累牍地追踪采访报道。多次的新闻大曝光，使这股狂风越吹越大，终成暴风骤雨之势。

阿拉伯国家对此的反应有的强烈，有的温和，有的沉默。最感恼火的是伊拉克，“感到被出卖了”，但是，一贯强硬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又不准备“同美国断交”，认为这是以色列“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破坏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阴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则表示震惊和失望，批评美国的作法“使华盛顿丧失了在这个地区的信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则默不作声，各怀心思。

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在埋怨，一些官员认为：“我们有种受到愚弄的感觉。”他们批评美国违背了它曾经要求它国恪守的信条，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宣称决不向恐怖主义分子妥协，并不遗余力地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暗地里却另行其是，这损害了美国在其盟国中的信誉。

美国国内的反应，犹如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

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但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实力的削弱，水门事件和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使美国人感到国家实力的衰落，对国家的信心也随之动摇。前总统卡特的私人民意调查专家卡特尔写道：“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中，这场近乎无形的危机不同于南北战争或大萧条。它与其说是物质危机，毋宁说是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它表现为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雄心勃勃的里根总统似乎给美国注入了活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外交较为活跃，美国的对手苏联则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收缩。这些“重振美国”的努力，重塑了公众对国家力量的自信，恢复了“美国第一”的优越感。美国人的心理“越来越平衡”了。里根的声望在执政6年来也达到了高峰。

然而，此时此刻，从黎巴嫩和伊朗传来的消息又使美国人的心理难以平衡了。新闻界和国会就象炸了窝似的，闹得满城风雨，批评和指责如同狂潮般席卷而来：政府同关押人质者谈判，违反了政府宣布的一贯政策，即决不同恐怖主义组织做交易，决不同伊朗，利比亚之类的“邪恶国家”谈判；向伊朗运送武器破坏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法律和在两伊战争中严守中立的法律；秘密外交活动背着国会进行，违反了行政当局应定期向国会通报秘密活动的法律。激动的批评者们最后集中于一个声音：“里根总统必须出来向美国人民澄清事情真相！”

里根露面 应付尴尬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内外舆论潮流，一向镇定自信、谈笑风生的里根，仿佛老了许多。1986年11月13日晚，他出现在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屏幕上，神情呆滞，表情尴尬。他首次承认。一年半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秘密外交接触，他的确于当年5月派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并曾授权向伊朗提供武器。他接着辩解说，政府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因为它有4个目标：同伊朗恢复关系；结束两伊战争；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他重申，政府的这些做法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保持沉默的风险已超出了把事情讲出来的风险。”

此后不久，里根无可奈何地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些天来，我喉咙里犹如卡着一个苦胆”。可见其窘迫之状。

11月9日，里根在白宫又举行了一周来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面对那些令人头痛的，曾被西奥多·罗斯福骂为“扒粪者”的“无冕之皇”们，里根显得局促不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他试图进一步解释他的政府在美伊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这一交易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次失败，相反，这场“风险很大的赌博”是有条件地进行的，并且达到了部分目的。

他说：“我就象一个赌徒，知道这个行动所冒的巨大风险。但这是我的一项活动，是我一个人的活动，我对胜负负全部责任。”“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尽管我没有象法律规定的那样及时向国会报告。为保护美国人质的生命安全，继续在某些方面保密的作法是正确的。”他接着责怪新闻界对这一交易的披露断送了另外两名美国人质获释的机会。

他还使用了林肯的名言作自己的挡箭牌：“假如事实证明是对的，这些指责将无关紧要，假如证明是错的，10个天使说我是对的也没用。”

当被质问到他是否破坏了向伊朗禁运武器的政策时，他摆了摆手，有些慌张地说：“为了我们的目的，放弃一下禁运是值得的。当然，武器禁运现在和将来仍继续有效。”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它国家参与此事时，他表示没有。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10分钟，白宫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人们可能对我今晚的一个回答会产生某种误解。确有一个第三国参与了我们的秘密计划。”但声明称第三国向伊朗运送武器不是由华盛顿授意的。所谓的第三国，白宫虽没有点名，但人们自然想起了以色列。

显然，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乱了方寸的，他未能平息国内外舆论的不满，没有平息国会山里嘈杂的指责声，反而使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穷追不舍，声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国会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进行调查，案情越揭越深，大有要把共和党政府拉下马之势。

事出有因 祸起萧墙

里根政府为何竟同被他们称为“邪恶之国”的伊朗打起了交道？而伊朗又如何接受了“大撒旦”的橄榄枝？说来话长。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经繁华一时，如今却成了世界闻名的恐怖之都。各派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炮战，枪战，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的焦点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激烈冲突，而美国长期执行一条纵容偏袒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自然，美国人成了某些阿拉伯激进组织搞恐怖主义活动的活靶子。

1984年3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遭绑架。此后一年多内，又先后有6名美国人遭到绑架，酿成了使里根政府伤透脑筋的人质危机。绑架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释放人质的3个条件，即释放1983年因参与策划和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科威特政府投入监狱的17名囚犯；美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释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贷款，开发南黎巴嫩。绑架者扬言，美政府若不答应其条件，人质将被逐个处决。

人质危机引起了美国国内各界的严重关注。里根政府一方面声称要作出强硬反应，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妥协；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求人质获释的途径，但收效甚微，时间越拖越久。绑架者似乎不耐烦了，他们说到做到，1985年下半年，在被绑架一年多后，巴克利的尸体出现在照片上。

里根总统在处理人质危机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一些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抨击政府“遗弃”人质。此时美国正值中期选举的前夕，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一些人也要求里根尽快想出办法，以缓解舆论压力，增强共和党人的选举资本。内外交困，里根寝食难安。

真是没有办法吗？不是。在美国政府为人质释放所作的种种努力中，他们发现，要找到一个既不答应绑架者提出的条件而又能使人质获释的办法，那就不能不与美国的冤家——伊朗打交道。因为伊朗对绑架者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这一发现使美国政府啼笑皆非。

正当里根政府苦恼之际，1985年8月，从贝鲁特和海牙国际法院传来了信息：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接触感兴趣，急切地希望同美国坐在谈判桌前。这一消息使白宫格外兴奋，里根当即召集国务卿舒尔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进行紧急磋商。里根认为，应该接住德黑兰抛出的红线，同伊朗谈判不仅可以为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能着眼于今后，即寄希望于霍梅尼之后，使美国“重返”伊朗。同伊朗恢复关系，对于美国搞活它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一盘棋是有巨大好处的。

而伊朗这方面，由于它同伊拉克打了6年，国库空虚，武器不足，经济上处于困境，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因而伊朗也有与美国做交易的愿望。这一政策重多地反映了以议长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的主张，并得到了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首肯。霍梅尼曾说：“如果我们走一步，大撒旦就会走100步！”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兴致勃勃的里根最后拍板：立即进行美伊秘密接触。这一任务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具体承办。另有报道说，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了一份由麦克法兰拟定的计划，通过以色列向伊朗供应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关系，使伊朗帮助释放美国人质。该项计划由麦克法兰和其

助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思中校具体负责。

在这场交易中，以色列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掮客的角色。“摩萨特”特务，军人商雅各布·尼姆罗迪曾作为美国的代表，同伊朗实业家马努赫尔·古尔巴尼萨尔商谈具体交易办法。1985年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迈克尔·莱丁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在欧洲某地会见了古尔巴尼萨尔。1985年9月3日，以色列官员向麦克法兰转达了伊朗方面的意向，即若美国能向伊朗运送一飞机军火，伊朗将在一天内帮助释放一名美国人质。麦克法兰当即拍板同意。在1985年辞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麦克法兰仍继续为美伊交易而奔走。1986年5月，他亲赴德黑兰，钉下以后爆发“伊朗门”事件的楔子。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易。

1985年9月，以色列先后两次租用DC—8型运输机满载“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同期，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美国人终于尝到了甜头。9月14日，里根打电话给佩雷斯，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就在此时，白宫幕僚们在是否继续进行美伊交易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以舒尔茨、温伯格为首的一方，主张停止美伊交易，而以凯西和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为首的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同魔鬼打交道也是可以的。双方毫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里根为调和双方矛盾，表示暂时停止与伊朗的接触。美伊一度回到互不来往的状态。

但是，问题并未解决、人质危机又紧迫起来，并严重地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里根权衡再三，终于下令恢复美伊军火交易。1980年7月到同年10月，美国先后两次给伊朗运送了军火，美国人质詹森、雅各布森先后获释。参议员邦伯斯估计，美伊军火交易总额可达1亿美元以上。

奇峰突起再掀波澜

1986年11月25日，华盛顿的晚秋使人觉得阵阵寒意，而此时的白宫东室内空气闷热、气氛紧张。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似乎预感到今天的气氛非同寻常。

不久，表情凝重的里根急步走上讲台。他看了一眼鸦雀无声的会场，然后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诺思中校参与一起他一无所知和不能容忍的活动，他宣布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并将诺思革职。他声称，这项活动未经他授权，直到11月24日他才获悉此事。他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很痛心。”

听众顿时屏住了气息。

司法部长米斯也走上了讲台，他宣布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周密调查后证实，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款项，有1000至3000万美元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入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也略知一二，但没有设法制止。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对此毫不知情。以色列参与了此事。

米斯的话一讲完，会场上顿时一阵轰动，兴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涌向电话，电传机，争先恐后地向世界报道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案情复杂化了，伊朗军售案忽然演变成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丑闻”，成为美国“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轰动”。绕过国会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违反了武器控制法和国家安全法；以武器交换人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相矛盾；而擅自挪用款项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又直接违反了1934年的博伦修正案。几个问题相互交织，里根政府一错再错，使得案情更加扑

朔迷离。

这时美国舆论界格外热闹，传闻不断，里根和他的政府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美国 ABC 广播网和《纽约时报》12 月 2 日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是 50% 以上的人认为里根知道转移款项一事，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里根在掩盖事实，里根的支持率从 1 个月前的 67% 陡降至 46%，下跌了 21 个百分点。新闻界则不断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并表示要穷追不舍，提出一系列的疑点和问题逼迫政府回答。

里根知道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伊朗官员于 11 月 28 日发表讲话，威胁要公开麦克法兰 1986 年秘访德黑兰期间与“白宫某人”通话的录相带，以示里根“欺骗美国民众。”《纽约时报》12 月 8 日进一步透露，麦克法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早在 1985 年 8 月里根就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军火，这与官方宣布的里根只是事后才知道的说法不符。12 月 7 日和 10 日，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分别表示，他们坚信里根总统知道军售款项转移一事。

内阁成员中有多少知情者？11 月 27 日，白宫内部有人向新闻界透露，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早在 1985 年就得知美伊接触，他对军售款项转移一事也了如指掌。里甘系里根多年挚友，他陷进泥潭，里根岂能清白如故？11 月 28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小组委员会给司法部写信，把副总统布什，白宫总管里甘，司法部长米斯，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统统列入怀疑对象。

军售款项到底转向何方？按照司法部长米斯 11 月 25 日的说法，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钱是由以色列转交的。但第二天以色列表示，所谓转交行动与以色列“毫不相干”。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也断然表示他们分文未收。《纽约时报》于 12 月 2 日披露，这笔钱还部分地转给了安哥拉反政府军和阿富汗游击队，而不象官方所说的仅限于尼反政府军。12 月 14 日，麻省的《洛维尔太阳报》又抛出一条爆炸性新闻，称军售款项中有多达 500 万美元用来资助 11 月国会中期选举中赞成援助尼反政府军的保守派候选人。

诺思的能量真有那么大吗？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奥利佛·诺思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 1943 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1968 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赴越南作战。以其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忠心耿耿而深受上级赏识。海军陆战队司令曾称诺思为“热情先生”。里根也称赞说：“他有良好的行为纪录，他是国家英雄”。在越战中，诺思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朋友们称他为“兰博”。的确，诺思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同“兰博”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据说，有一次他被 10 名越军包围，当时他身上只带着一把塑料叉子，情况十分危机，但最后诺思还是脱离险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81 年，诺思由海军部长推荐，进入白宫工作。此后，他一直负有许多秘密使命，往往早晨在华盛顿，晚上则出现在欧洲某地追缉恐怖分子的现场！1985 年 10 月，他参与策划成功地拦截载有劫持意大利邮船“阿基莱·劳罗”号的恐怖分子的埃及飞机。

在伊朗门事件中，诺思一直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参加了同伊朗的交易，寻找出售武器的中间商，安排把出售武器所得款项存入瑞士银行，并 9 次亲自指挥在尼加拉瓜境内空投补给。在美伊武器交易败露后，诺思销毁了大量有关文件。在被迫辞职后，他仍指使其女秘书霍尔到办公室取出匆忙中未来得及处理的文件，忠心耿耿的霍尔把文件藏在靴子里和衣服里，躲过白